

■ 宗教与文化

论元代佛教管理中的权力分配

尹 雁¹ 何 琦²

(1.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2. 中国科学院 南京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 元朝时期,佛教发展昌盛,元廷重视对佛教的管理,1288年,成立了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仁宗时期,将与司法有关的佛教事务划拨御史台,文宗年间,成立太禧宗禋院,负责寺院经济,从而完成了对佛教管理的权力再分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它巩固了元中央集权,彰显了国家司法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它符合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需要,为元后期的佛教管理体系的重新构建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元代;佛教管理;权力分配

[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1)07-0168-05 [收稿日期] 2010-11-10

[作者简介] 尹雁,女,山东济宁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何琦,女,江苏南京人,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中国佛教史上,元代的佛教管理独具特色,佛教的人事、经济和司法权分属宣政院、太禧宗禋院和御史台,这种权力分配是如何进行的,对元代佛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值得探讨。

—

元代立国,实行“政教二道”统治体系,所谓“政教二道”,政即皇权之法;教即教权之律。也就是“圣教主之法王喇嘛和大政之主世间的权利可汗等的”^[1]。蒙古帝国的缔造者很早就知道宗教在对外征服和巩固政权方面的作用,成吉思汗时代,制定了特殊的宗教政策,即“对待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2]。后世诸王多严格奉行。忽必烈潜邸时,与佛教结缘,接受了藏传佛教僧人八思巴的灌顶,皈依了佛教。忽必烈对佛教的信仰,对蒙元帝国的宗教政策影响很大,1260年,他即位成为蒙古国大汗,宣谕天下“昔印度摩诃萨摩迪合罕所创建之政教两道并行之四大纲领,由佛祖释迦牟尼革新实施,后传至吐伯特三大转金法轮查克拉瓦伦合罕,周密无疏漏地实施,尔后传至蒙古地方由圣雄先祖成吉思罕精心实施治理国邦民众焉。朕今亦行此政教两道于国度矣。”^[3]以成吉思汗之名,行政、教两道法于国内。1270年,在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后,忽必烈又敕封他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

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4]。帝师的设置,标志着“政教二道”统治体系的确立,有利于佛教的发展。

元朝前期,佛教发展迅速。寺院、僧人数量庞大,至元二十八年(1291),据官方统计,全国有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私度、无籍的僧人不包括在内,僧人之多可以想象。佛教经济也很发达,寺院拥有大量地产,从事商业经营,拥有巨额的财富、雄厚的经济实力。这引起统治阶层的关注,如何有效地管理佛教,使之继续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为巩固政权服务,成为元前期统治集团的重要议题。

元代初帝忽必烈是一位“思大有为”的君主,他在信仰佛教、扶植佛教发展的同时,注重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他即位后不久,设立了释教总统所。总统所成立于中统初年,是元政府设立的第一个佛教管理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最高长官为总统,多由僧人担任。至元三年(1266),“以僧机为总统居庆寿”^[5]。总统所的主要职能是选拔僧官,“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6]。路、府、州、县等各级僧官的选拔皆由总统所负责,并制定了“中选”标准。换言之,总统所掌握对各级僧官的人事任命权,并通过各级僧官,

实现对全国佛寺、僧人的管理。至元四年(1267),世祖下诏“禁僧官侵理民讼”^[7],是因为当时僧官的权力很大,不仅裁断与僧人有关的诉讼,甚至民间诉讼也经常参与,严重干扰了国家司法权的正常实施,所以朝廷不得不明令僧官的权限。也就是说,世祖时期的佛教管理机构集人事、经济、司法权于一身,僧官的权力之大可以想象。

1264年,元廷设置了总制院,“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8],以国师八思巴统领之。笔者以为,总制院主要是为了吐蕃事宜而设,其成立的初衷也许并不是为了佛教的发展或管理。这一时期,忽必烈的统治日趋稳固,吐蕃各地逐步归顺,元政府需要代行管理吐蕃的人选。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法主,很早就与忽必烈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①深得忽必烈的信任,由他管理吐蕃最为适宜。但八思巴也是蒙古帝国的国师,是佛教界地位最高的僧人,掌管天下释教是份内职责。是以,在这种情况下,八思巴成为第一任总制院院使。^[9]随着总制院的成立,中央一级的释教总统所被撤销,但地方诸路释教总统所仍然保留,并归属总制院管辖。至元二十八年(1291),“陇西四川总摄鞏真术纳思为诸路释教都总统”^[10],说明地方一级的释教总统所依然存在。和总统所一样,总制院的任职官员,都是僧俗并用。总制院院使地位崇高,八思巴之后,院使多为继其之位的帝师或亲信,^[11]最后一任院使桑哥,“能通诸国言语”^[12],曾为八思巴的译吏。由于总制院的职能广泛,又下辖吐蕃各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13],其佛教和政治地位日显重要,应“以崇异之”^[14]。1288年,桑哥向朝廷正式奏请,“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15],把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元史·百官志》记载“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大征伐,则会枢密府议。其用人则自为选,其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16]第一任宣政使桑哥,世祖命他开府仪同三司,兼领尚书右丞相、功德使司事。宣政院可用三台银印,有府邸、官阶、品级,是一个体制完备的衙门机关。

从总统所到宣政院,随着名称的改变,该机构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权力愈加扩大,不仅负责吐蕃事宜,还掌管佛教人事、经济、司法权。但是,这一时期,佛教管理也愈加混乱,僧人骄横,其下属地方各级机构,如行宣政院、诸路释教总统所、总摄所等,迭

经废置,说明宣政院事务的繁杂,对佛教事务管理的不从心,这成为宣政院后来被分权的重要原因。

元中期,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元政府开始了对佛教管理权力的再分配。至元三十年(1293),中书省准杭州行宣政院奏“俗人与和尚每有争差的言语呵,和尚每的为头儿,一同问了断者,民官和尚每根底休教断者么道”^[17]。僧俗发生纠纷时,民官与僧官共同裁断。这是发生在世祖时期的案例,终忽必烈一朝,优渥僧人,尽力保护僧人的司法权益。成宗时期,随着僧务机构的增多,佛教管理日趋混乱,僧人中良莠不齐,作奸犯科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德二年(1298),朝廷下诏“僧人犯奸盗诈伪,听有司专决,轻者与僧官约断,约不至者罪之”^[18],对僧人犯罪严惩不贷。1299年,帝师也有法旨:和尚做贼,与俗人一体刺字,依例断配发落……发遣元籍还俗……^[19]表示了对朝廷政策的接受。但是,在处置违法僧人的时候,也有僧官涉嫌包庇,对此,大德六年(1302),成宗又下诏“自今僧官、僧人犯罪,御史台与内外宣政院同鞠,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听御史台治之”。^[20]所谓内外宣政院,是指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行宣政院,他们负责对僧官的任命,僧官犯罪,应由宣政院处置,但御史台逐步代行其职权,说明僧务机构已经不再被政府信任,所执掌的司法权被渐行剥夺。武宗海山是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位时,曾准宣政院奏: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21]幸被时为储君的仁宗及时制止。也正因如此,他在位期间,僧俗纠纷不断。“至大元年(1308),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摔诸地……二年,复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剌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22]僧人的骄纵行径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至大四年(1311),仁宗亲政后,立即宣布“罢总统所及各处僧录、僧正、都纲司,凡僧人诉讼,悉归有司。”^[23]十月,“罢宣政院理问僧人词讼。”^[24]废除了佛教机构的司法权限。皇庆元年(1312),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干政,奏请释放有罪的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帝直斥之曰“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25]表明了仁宗不愿僧侣干预国家司法的态度。仁宗的举措,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成宗在位时,仁宗被贬怀孟(今河南沁阳),曾亲眼目睹僧官的腐败,“在前我栲栳山回来

时到潞州呵,平阳的僧录腊月八日就潞州我的陆水寺里杀羊唤歹妇女每吃酒,又和尚每告他则潞州里要了玖拾余锭钞来”。他认为“干净的好和尚每在寺里住着念经,与咱每祝寿也者;不干净的歹和尚每要做僧官有”^[26],对僧官的印象极差,也因此,他即位后,立即废除了地方各级僧务机构,收司法权归御史台。

蒙元时期,寺院经济繁荣发展,统治者尊重佛教的利益,对寺院财产实行保护政策,窝阔台时,皇子阔端曾两次颁旨给封地内的鄆县(今陕西户县)草堂寺,要求当地诸管民官员出资修盖草堂寺,并且“无得科差骚扰僧人,侵占寺院田土”^[27]。忽必烈时,也曾直接下旨给寺院,以保护寺院财产,如中统初(1261)年,他下诏给林州宝岩寺、邢州乾明寺、龙兴寺,“这底每寺里、房子里,使臣休安下者;拣那谁使气力休住者。官粮休顿放者,拣那什么物休顿放者。寺院里休断事。铺马只应都休舆者,商税粮税休纳者。但是属寺家底田地、水土、竹园、水磨有底园林、解典库、浴堂、店、出赁房子根底,醋、酵曲根底,拣那什么人休使气力夺要者。”^[28]规定凡属寺院的房产、土地、店铺皆属寺院所有。元初,世祖曾赐建兴修了许多寺院,被称为官寺,如大护国仁王寺。武宗时又赐建了南镇国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圣寿万安寺,皆归宣政院管辖。这些寺院的财富惊人,所拥有的地产、商店等,多来自皇室的赏赐,也有贵族、平民的施舍。如中统二年,世祖赐“庆寿寺、海云寺陆地五百顷”^[29]。至元二十五年(1288),听闻江淮总摄杨琏真加言,以宋宫室为塔一,为寺五,已全部建成,诏“以水陆地百五十顷养之”^[30]。成宗大德年间,“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干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31]。顺帝时,“有大官妻无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尽入于僧寺……”通过各种方式,寺院积累起巨额的财富。对于寺院的财产经营,纳税与否,元政府的政策曾有反复,至元十四年(1287),“诏以僧亢吉益、邻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32]。二十八年,又“宣谕江淮民恃总统琏真加力不输租者,依例征输”^[33]。三十年(1293),“敕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其物货依例收税”^[34]。出现这种情况,与宣政院对佛教经济的掌控有很大关系。为管理寺产,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

入,元政府着手对宣政院的经济权进行剥离。以大护国仁王寺为例,至元十一年(1274),寺院建成,规模很大,下辖众多的地产、寺户,为此,元廷设置了财用规运所,专门管理寺产,秩正四品,相当于一个地方路级行政机关。十六年(1279),规运所升为总管府,统辖襄阳营田提举司、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仁王营缮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和会福财用所等机构,以掌管散处各地的田产和店铺。至大元年(1308),总管府改为都总管府,升从二品。不久又改名为会福院,设置院使。天历元年(1328),正式定名为会福总管府,正三品,置达鲁花赤和总管各一员,另有同知、府判、译史等佐官。后来,随着官修寺院的增多,在负责管理全国各大寺院财产方面,形成了会福、崇祥、隆禧、寿福四大总管府。文宗时期,设置太禧院,天历二年(1329),太禧院更名为太禧宗禋院,统领以上诸总管府,“凡钱粮之出纳,营缮之作辍,悉统之”^[35]。太禧宗禋院掌管寺院的财政收支,并负责寺院的修造维护,至顺二年(1331),其下属隆祥司使晃忽儿不花曾言“海南所建大兴龙普明寺,工费浩穰,黎人不胜其扰,以故为乱”^[36]。太禧宗禋院的长官被称为院使,秩从一品,与宣政院使品秩相同,可推知,太禧宗禋院与宣政院不具备统属的可能。于是,从宣政院前期的集权模式到中后期司法、经济权的被分离,元廷完成了对佛教管理权的再分配。

二

元朝中后期,佛教管理权的重新分配,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和佛教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试分析之。

其一,司法方面,维护了国家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行。“延佑元年(1314)八月,行台付准……浙西廉访司申,杭州路僧人崇圭告信寺主奸占良妇,非违不法,与和尚相告不同……县吏吴寿之取受,必须信寺主指证方问照得……管民官休管和和尚者,欵此看详,各寺住持头目与本寺僧人互相言告,非违不法,并僧人干碍取受等事,未审如何归问,咨请照详准此呈奉……”^②僧人之间的诉讼,有时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损害佛教清誉,必须严格审查,管民官依法审问、处理,既彰显了国家法典的威严,又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至治元年(1321)二月,浙江僧人赴江南浙西道廉访司陈告,行宣政院官吏违法纳贿,廉访司依照以往圣旨,该司有权照刷行宣政院文卷,请示了江南行御史台,得准”^③。江南地区的佛教,极为昌盛,宋

代就有“除却弦歌庠序外 家家同念佛经声”^④之誉,元代时继续发展。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廷在该地区设立了行宣政院,是宣政院的派出机构,院使为从二品,佐官有同知、经历、都事、照磨等。作为佛教管理机构,其目的主要是保护僧人利益,促进佛教发展。这条材料显示,行宣政院官吏以管理佛教之名,向僧人索贿,引起僧人的愤恨,诉诸地方司法机构,寻求解决。此事发生在至治年间,而行宣政院曾被废除,延佑五年(1318)复置,也就是行宣政院重设后不久,官员如此腐败,这种行为对佛教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泰定元年(1323),“……宣政院判官术邻亦取赂于富僧,答里麻劾之。”答里麻时任福建廉访使,弹劾了杭州行宣政院判官术邻。地方行台对这些佛教事务的干预,对佛教机构的整治,既显示了国家司法对佛教的尊重,维护了佛教的利益,也有利于佛教的良性发展。

其二 经济方面,有利于政府对寺院经济的全面掌控,避免了寺院内腐化现象的滋生。至元年间,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曾发掘原南宋皇室、贵族陵墓,得宝无数,修建寺院,引起江南士民公愤,令元政府非常被动。随着掌管寺院经济机构的成立,如营田提举司、营缮司以及会福、隆禧总管府等以至太禧宗祿院,政府加强了对寺院经济的控制。成宗时期,有富户为规避差税,冒为僧道,遭到弹劾,“与编氓无异,清汰为民”^[37]。元廷给予寺院的优惠政策,被不法分子利用,逃税、避税,所产生的后果,不仅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使得一些民众不能被纳入政府编户体系,有碍国家赋税差役的征收执行。太禧宗祿院的设置,对寺院经济的监控,可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至顺元年(1330)八月,“有言蔚州广灵县地产银者,诏中书、太禧院遣人莅其事,岁所得银归大承天护圣寺”^[38]。十一月,“以临江、吉安两路天源延圣寺田千顷所入租税,隶太禧宗祿院”^[39]。后至元五年(1339)三月辛酉,“八鲁剌思千户所民被灾,遣太禧宗祿院断事官塔海发米赈之”^[40]。太禧宗祿院成立后,在经营寺院经济的同时,也获得了来自政府的大量资金支持,拥有了更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积极投身社会事务,惠及民众,扩大佛教的影响。

其三 宣政院成立的初衷,是统领全国佛教并掌管吐蕃事宜,随着司法、经济权的被分割,其管理吐蕃的职能被强化,对地方佛教事务也更加注重。元

朝中后期,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上,权臣当道,为争权夺利,纷争不断,无暇顾及地方。泰定二年(1324),“阶州土蕃为寇,巩昌总帅府调兵御之”^[41]。天历二年(1329),“囊加台以兵至金州,据白土关,陕西行省督军御之”^[42]。阶州、金州皆邻近吐蕃,阶州又是吐蕃族人作乱,而吐蕃是宣政院直辖地,在这种情况下,为加强对吐蕃地区的控制,宣政院增设了西番行宣政院,后至元三年(1337)五月,“西番贼起,杀镇西王子党兀班,立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儿为院使,往讨之”^[43]。西番行宣政院主要掌管对吐蕃地区的军事行动,它的设立,标志着元廷对吐蕃地区统治的加强,有利于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佛教方面,由于宣政院专职佛教人事权,它开始注重对地方佛教事务的管理。至顺二年(1331),文宗设置了十六道广教总管府,职掌地方僧尼之事,分别为京畿山后道,河东山右道,辽东山北道,河南荆北道,两淮江北道,湖北湖南道,浙西江东道,浙东福建道,江西广东道,广西两海道,燕南诸路,山东诸路,陕西诸路,甘肃诸路,四川诸路,云南诸路,辖区覆盖除吐蕃地区以外的元中央实际统辖地,加强了对地方佛教事务的管理,为构建元后期地方佛教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另外,这一时期,在提高僧人的政治待遇方面,宣政院也恪尽职责,至顺二年正月,文宗任命住持大承天护圣寺的僧人宝峰为司徒。三月,又“以西僧旭你迭八答剌班的为三藏国师,赐金印”^[44]。顺帝后至元三年,“西域僧伽刺麻至京师,号灌顶国师,赐玉印”^[45]。

结语

元代,藏传佛教流入汉地,被尊为国教,元廷在支持佛教发展的同时,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管理佛教的方式。以宣政院、太禧宗祿院、御史台分掌佛教事务的管理模式的形成,就是这些探索经验的总结,它符合元中后期佛教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元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

注 释

①八思巴是忽必烈的灌顶国师。参见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②《元典章》卷53,刑部15,僧人诬告违法及过钞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③《元典章新集·至治条例大全》“僧尼诬告官吏廉访司追问”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祝穆《方輿胜览》卷10之连真诗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考文献

- [1] 乔吉. 白史[A]. 蒙古佛教史[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58.
- [2] 志费尼著. 何高济译. 翁独健校. 世界征服者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20.
- [3] 鲍音. 〈十善福经白史〉浅译[J].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 1987(2): 44—45.
- [4] 阿旺贡噶索南著. 陈庆英, 高禾福, 周润年译注. 萨迦世系史[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2: 141.
- [5][6] 志磐. 佛祖历代通载》卷 48,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6.
- [7] 宋濂等. 元史(卷 3) [A]. 世祖纪三[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8] 宋濂等. 元史(卷 114) [A]. 桑哥传[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9][11] 张云. 元代吐蕃地区的行政体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0] 宋濂等. 元史[A]. 世祖纪十三[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2][14] 宋濂等. 元史[A]. 奸臣传[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3] 宋濂等. 元史(卷 205) [A]. 奸臣传[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5][16][35] 宋濂等. 元史(卷 87) [A]. 百官志三[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7][19]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43) [A]. 刑部卷 15[C].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 [18][37] 宋濂等. 元史(卷 19) [A]. 成宗纪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0][31] 宋濂等. 元史(卷 20) [A]. 成宗纪三[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1][22] 宋濂等. 元史(卷 202) [A]. 释老传[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3][24][25] 宋濂等. 元史(卷 24) [A]. 仁宗纪一[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6] 黄时鉴点校. 通制条格(卷 19) [A]. 僧道·词讼[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325.
- [27][28] 蔡美彪. 元代白话碑集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13 22.
- [29] 宋濂等. 元史(卷 4) [A]. 世祖纪一[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30] 宋濂等. 元史(卷 15) [A]. 世祖纪十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32] 宋濂等. 元史(卷 9) [A]. 世祖纪六[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33] 宋濂等. 元史(卷 16) [A]. 世祖纪十三[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34] 宋濂等. 元史(卷 17) [A]. 世祖纪十四[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36][44][明] 宋濂等. 元史(卷 35) [A]. 文宗纪四[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38][39] 宋濂等. 元史(卷 34) [A]. 文宗三[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40] 宋濂等. 元史(卷 40) [A]. 顺帝纪三[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41] 宋濂等. 元史(卷 30) [A]. 泰定帝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42][明] 宋濂等. 元史(卷 33) [A]. 文宗纪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43][45][明] 宋濂等. 元史(卷 39) [A]. 顺帝纪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责任编辑: 刘俊沅)

(上接第 167 页)

- [3] 杨汉平. 工业合作的技术问题[J]. 工业合作, 1942 3(6): 36.
- [4] 喻志东.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M]. 上海: 黎明书店, 1941: 52.
- [5] 王作田. 指导工合社业务上应注意之各点[J]. 西北工合, 1940 4(9): 7.
- [6] 魏元光.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之展望[J]. 工业合作, 1939 1(2): 1.
- [7] 史世民. 本区各社二十九年年终决算之分析[J]. 湘桂工合, 1941 1(2): 34.
- [8]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员. 中国东南的工合. 吴景平.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M].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 196.
- [9] 陈翰笙. 目前工合的困难问题. 汪熙、杨小佛. 陈翰笙文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173.
- [10] 包永林. 两年来工合工作回顾[J]. 湘桂工合, 1941 1(5—8): 27—28.
- [11][31] 任兆和. 本会四年来之技术工作概况[J]. 工业合作, 1942, 3(6): 32 23.
- [12] 三年来之川康工合[J]. 工业合作, 1942 3(1—2): 55.
- [13][19][34][37][38] 毛北屏. 滇黔区工合三年来工作概述[J]. 工业合作, 1942 3(1—2): 61 61 63 61 61.
- [14]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第一次工作会议[J]. 工合之友, 1939 1(7): 225.
- [15][16] 埃德加·斯诺. 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 载刘力群编. 斯诺通讯特写选[M]. 新华出版社, 1985: 160 160.
- [17] 张法祖. 发扬培黎精神[J]. 工业合作, 1942 2(1): 74.
- [18][39] 刘平. 抗日战争时期赣南的“工合”运动[J]. 江西大学学报, 1985 4(3): 16.

- [20] 埃德加·斯诺. 为亚洲而战[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178—179.
- [21][30] 王毓麟. 发刊词[J]. 工业合作——技术副刊(创刊号), 1944 1(1): 1.
- [22] 工合研究所扩大研究工作[J]. 工业合作半月通讯, 1945 1(15—16): 29.
- [23] 张铭柱. 工合技术改进问题邹议[J]. 工业合作月刊, 1942 2(2): 50.
- [24] 工合情报[J]. 工合之友, 1939 4(4): 128.
- [25] 本会与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合办工业试验所报告.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概况, 30—32.
- [26] 孙镜清. 工业试验所半年来工作概况[J]. 西北工合, 1941 4(16): 11.
- [27] 卢广绵. 四年来的西北工合[J]. 工业合作, 1942 3(1—2): 45.
- [28] 石鸣. 三年来之川康工合[J]. 工业合作, 1942 3(1—2): 55.
- [29] 黄文炜赣闽粤区技术研究所概况工业合作, 1941 1(5—6): 68.
- [32] 路易·艾黎. “工合”的技术训练问题[J]. 中国工业, 1944, (23): 20.
- [33] 卢广绵. 四年来的西北工合[J]. 工业合作, 1942 3(1—2): 45.
- [35] 陈翰笙. 工合——中国合作社史话. 汪熙、杨小佛. 陈翰笙文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206.
- [36] 卢广绵.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卢广绵. 回忆中国工合运动[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92.

(责任编辑: 贺永泉)